

* 師資培育文獻回顧 *

芬蘭 PISA 奇蹟背後的兩個弔詭

鄭景澤

(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生)

PISA2000 測驗報告指出，在所有 OECD 的國家中，芬蘭學生的語文及數理能力表現最為出色優異。一個常見的解釋，是將芬蘭學校教育的成功，歸諸於該國優質的師資教育及教學方法。本文在不低估這些解釋的前提下，提出潛藏在芬蘭教育成功背後的社會、文化與歷史因素。從歷史及教育社會學的角度來看，處在東西方交界的芬蘭，其社會制度保留著東方威權主義的元素，而這塑造出一種順從的民風，即學生服從於傳統承認的教師權威地位，讓芬蘭教師得以施行保守的教學方法，最後順利產出符合 PISA 測驗要求的教學成果。諷刺的是，以「開放」、「進步」為訴求的 PISA 測驗，竟多方反映著「優勝國芬蘭」那威權主義的意識型態和守舊刻板的教學原則。這兩個諷刺性的弔詭，正突顯出 PISA 測驗本身的問題。我們要問的是：像 PISA 這樣的國際性評比測驗，是否真的能夠讓人充分瞭解不同國家的學校教育？

近年來，在各國綜合學校教育成果的評比中，芬蘭學生的總體表現最為出色。其中，PISA2000 的測驗報告，讓芬蘭的綜合學校教育變成各國競相參照的典範。PISA2000 是一項由 OECD 主導的計畫，用以調查 32 個國家年滿 15 歲的學生；而調查結果之一是，芬蘭學生在閱讀、數學及科學素養上，均是參與國中最佳的。此外，PISA2000 測驗報告還提到，芬蘭學生及學校表現之積分差異值在所有 PISA 受測國家裡均是最小的。由此得出的結論是，芬蘭的綜合學校在教育成果上，已成功地結合了卓越的表現及高度平等性。根據接續的 PISA2003 測驗結果顯示，芬蘭的綜合學校教育繼續取得衛冕寶座。

在不低估那些「從教學角度來探討芬蘭教育成功」的論述前提下，作者將本文中聚焦在幾個討論芬蘭教育時，被完全忽略掉的社會及歷史因素。基本上，我們可以合理地推想到：學校教育的內容並不侷限於教育學、教學法或主題，其中尚還（甚至主要地）包括社會、文化、機構與歷史性的要素。

一、信奉威權主義的芬蘭歷史

芬蘭歷史中有某些特殊的層面，這對理解芬蘭的學校教育來說，是有其必要性的。我們可以這麼說，芬蘭文化中依舊含有一種意義重大的元素，即一種獨裁主義、集體主義和犬儒主義的心態。由於其地理上及地緣政治上的位置，芬蘭向來就是個處在東西方交界的國度；而不容忽視的是，19世紀芬蘭民族國家的誕生，是在俄羅斯帝國的庇護下，才得以實現的。東方的諸多元素，以各種明顯的方式，在芬蘭社會各層面表露無遺，從芬蘭的行政傳統到芬蘭人的基因遺傳。作者認為，相較於其他北歐國家，芬蘭的社會民主制度，事實上保留著某種東方獨裁主義或集權主義的特色。

另一個令芬蘭跟其北歐鄰居們有所不同的歷史事實是：它歷經過諸多戰爭，包括近代歐洲史上最血腥的內戰之一。就心理暨歷史的角度來看，促使芬蘭人自然而然達到「社會共識」的那些特質，或許可透過以下這兩個面向來加以理解：「意識到身為一個處於東西交界的國家」及「將內戰的精神創傷帶入到集體心態裡」。在芬蘭人的文化及心靈裡，含有一些古老的東西、一些威權主義的東西、或許甚至還有一些東方的東西，而這些東西多多少少都滲透到芬蘭的學校教育裡頭去。

二、芬蘭教師的相對崇高地位

第二個讓人感興趣的要點是，芬蘭綜合學校裡的教師，享有比多數先進國家的教師還要崇高的地位。甚至，不論是哪一社會階級的芬蘭人，顯然都讚賞且尊重教師的工作。有個可以清楚看出芬蘭教師「相對崇高地位」的指標：教職在芬蘭大學生的眼裡，是個大受歡迎的職業。雖然芬蘭專科教師培訓的申請者，目前尚稱不上踴躍（尤其是在理工領域），但是在芬蘭的高中畢業會考裡，「教書」仍為大多數高中生選填的第一志願。在《赫爾辛基直言報》（Helsingin Sanomat）針對高中畢業生所進行的調查中，「教職」受歡迎的程度排名第一，明顯凌駕一些傳統上讓人喜愛的職業，比如醫師、律師、心理學家、工程師或記者等。

芬蘭教師明顯地受到民眾、政治菁英及經濟菁英的信任，這種情形在國際間是相當罕見的。芬蘭具領導地位的商業雜誌《經濟學》（Talouselämä）曾於2001年登出一篇討論綜合學校的刊頭文章，鼓吹需要有更多的資源，來提升芬蘭學校



體系的辦學品質，使其免於受到全球金融風暴的衝擊與影響。這顯示教育工作的從業者地位，是受到商界人士擁護的。

三、認同上層社會的芬蘭學校教師

芬蘭綜合學校裡的教師認同於上層階級，但其對政治的看法則顯得保守。芬蘭教師是經歷了漫長的過程，才被一般民眾及上層精英所共同接納的。早在芬蘭教師們作為一個團體而存在時，其就已經是「在兩條陣線上」打一場中產階級的戰爭。一方面，他們奮力去說服一般大眾關於學校教育的「功能性」——將孩子留置在學校是一種明智的行為，並力求贏取家長的信賴。另一方面，他們也同時去說服政治機構相信「義務教育」的有用性與生產力。

令芬蘭教師階級攀升的一個根本要素是，他們格外堅持「專業化」的步伐。早在 1890 年時，小學教師就主張，政府為其安排的進修培訓，應達到大學的水準。據一位芬蘭史學家 Halila 的說法，二戰之前，在芬蘭擁有高級中學證書的小學老師比其他任何國家都還要多。此外，芬蘭於 1930 年代成立了加瓦斯奇拉教育學院（College of Education in Jyväskylä），戰後又緊接著在更大的城市建立了三所教師培訓學院，這些是首批培訓大學學歷的小學教師之機構。而自 1950 年代晚期開始，芬蘭教師工會即積極地要求小學教師的培訓，應達到跟文理中學（grammar school）教師相同的教育水準——學士以上學歷。

作者最關注的焦點時期是 1970 年代，因為芬蘭當時推動了三項關鍵性的改革。第一項改革是「綜合學校改革（Comprehensive School Reform）」（1972-77），原雙軌制的學校體系——八年的義務學校及並行的文理中學，被代之以單一的、混合能力的綜合學校；在綜合學校裡，全體學童是接受九年的義務教育。第二，芬蘭在 1973 年到 1979 年間實施了「師資教育改革（Teacher Education Reform）」，其徹底改變了小學教師的培訓，「師資培訓單位」從原本的「教師培訓學院」及小鎮的「教師培育所」移轉到新大學的各教育科系；後者的設立，也屬於教改內容的一部份。1979 年，芬蘭政府將小學教師的培訓提升到碩士學位的水準，此大幅提升了「教育研究」在教師培訓過程中的角色。第三項改革是「高等教育之一般教學大綱及學位改革（General Syllabus and Degree Reform in Higher Education）」（1977-80），其廢除了學士學位的學歷規定，唯「學士學位」到 1994 年時才又恢

復，現則因歐盟的「波隆納進程（Bologna Process）」而被強化。

芬蘭 Turku 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Risto Rinne (1988: 440) 曾將「芬蘭的教師地位」總結如下：大眾喜愛的教師們受到非常高度的訓練。除了在過渡時期之外，國家與教師工會（OAJ）間的關係發展良好，教師罷工活動相當罕見，而綜合學校的改革，亦提升了教師的社會地位，並增加其對教育政策的影響力。芬蘭教師越來越成為國家的一位可靠盟友、文化暨經濟上的菁英份子。民眾甚至還時時被提醒著，唯有透過教育，其子女才有可能攀爬社會的階梯，或維持現有的社會地位。就教師決定了孩童未來的這一點來看，其乃扮演著法官的角色，而此項裁決的權利，則是國家從上頭、家長由下頭交付給他們的。

四、芬蘭教師教學法上的保守主義

芬蘭綜合學校裡的教師們，在教學法上的態度是保守的，而且跟學童及其家庭的關係，也多少顯得有點含蓄、疏遠，他們認為沒有必要放棄他們傳統「權威式」的教學方法。雖然有越來越多的家長和學童不再接受「行為主義式」的教學方法，希望獲得「個別化教學」的待遇，但絕大多數的人，仍舊信服於這種教學方法。作者從一項針對北歐教師的訪談研究中發現，芬蘭教師與北歐教師之間的差異處在於「師生互動」和「親師互動」的程度。當其他北歐教師都一致地強調營造良好的師生互動氣氛時，大多數的芬蘭教師則是以「成人模範」及「教室秩序維護人」的身分來向學生授課。一些經驗豐富的芬蘭教師並不希望建立親密的師生關係，而是注重保持某種「專業的」的師生距離和親師距離，這才是重要的。

五、芬蘭教師對其工作的滿意度

在此要納入考量的第五點是，芬蘭綜合學校的教師似乎都相對滿意於、亦堅守於自己的工作。作者訪談 50 名芬蘭教師後發現，他們相當滿意於 1990 年代的教育改革，幾乎所有人都將這「十年教改」視為是一種進步。他們對於最近諸般改革的目標（例如：加強學校自主權、鼓勵教師和其他專家合作、強調學生的個人需求及興趣等），均給予正面的評語。芬蘭的一些研究，亦支持這個「相對滿意且盡職」的現象。一項針對芬蘭教師壓力的調查研究發現，許多教師的確都滿意於自己的工作，且堅守崗位。他們認為教師工作是有成就感的、工作環境是良好的，





而且在工作場所裡，亦得到正面的社會支持。有百分之八十的應答者，同意下面這兩項陳述：「教師工作是有成就感的，而且我是因為喜歡它才去做它」及「我堅守我現在的教師工作」。

六、芬蘭教育不再是個奇蹟

總結一下前面提出的幾個社會性及歷史性的觀點：首先，芬蘭社會盛行著一種有點古老、威權，卻又集體性的文化；其次，芬蘭人對教師產生一定程度的信賴與讚譽；再次，芬蘭教師圈裡，有一種政治上及教學法上的保守心態；最後，芬蘭教師相對滿意於、也堅守於自己的教學工作。

另外值得一提的是，芬蘭建構了一個組織完整、效能卓越的特殊教育體系，其將大部分「有困難的」學生，從教室移送到特殊教育單位或診所去，從而確保一定程度的「教室同質性」。直到最近五年，芬蘭政府才開始重視特教學生「回歸主流」的教育議題，儘可能地將其整合到「正常的」教室裡去。那些被診斷為「特教生」的學童在過去十年間成長了兩倍。在1995年時，這批為數一萬七千名的特殊學童，幾乎全都是接受集中式的特殊教育；到了2003年時，也只有百分之四十的特教學童，被完全或部分地整合進普通的教室裡。正是從這種強烈的「平等民風」及落實綜合學校教育的觀念裡，產生出芬蘭教育成效的另一面，即貫徹「不放棄任何一個孩子」的想法，這尤其可在初等教育及特殊教育中見到。我們可以公平地說：「學生同質性的程度」及「強健的特殊教育體系」，使芬蘭教師課堂上的學生得以整合且和諧。

無論如何，芬蘭的「PISA 奇蹟」現在看來不再是個奇蹟了。要言之，芬蘭教師依舊可以用傳統的方式進行教學，因為他們信奉著傳統的教師角色，且學童們也接受其傳統的從屬地位。一方面，芬蘭教師的信念和專業地位，是受到社會信賴的；另一方面，芬蘭學童在課堂上的乖順及服從，則是受到該國威權主義文化的影響。

七、芬蘭教育成功故事裡的兩個吊詭

綜言之，在芬蘭學校教育的成功故事裡，我們可以看出兩個吊詭來。首先，

PISA2000 所描繪出來的模範學生，顯然都帶有一種「順從」的性格，而這和芬蘭歷史中信奉「威權主義」的民風不謀而合。此弔詭導致以下這個問題：倘若教師不再自詡為「模範公民」及「知識傳遞者」的傳統角色，而是自視為某種協助者、導師和顧問的話，那麼芬蘭學校裡的「教與學」會產生什麼樣的變化呢？倘若芬蘭學童不再乖順就學，而寧願去「翻牆」的話，那麼芬蘭教育又會產生什麼樣版本的故事呢？

第二個弔詭是，在政治上及教學法上具有「進步性」的綜合學校改革，在芬蘭明顯是由那些「態度保守」的教師們所執行的。但是，最後的結果竟然比其他幾個國家更能達成目標。此項弔詭所引出的問題是：芬蘭是否有可能輕易地從舊式的「威權主義教育」轉變成另一種升級版的「新威權主義教育」呢？由於芬蘭缺乏某種「以學童為中心」的教學傳統，該國教師或許更容易採取一些便宜行事的教學方法吧！

八、芬蘭 PISA 奇蹟對我國師資培育的啟示

從上文中，我們可以瞭解到，芬蘭的教育奇蹟，不是只建立在該國的師資培育改革措施上，其更受到深層社會結構因素的影響。如今各國「眼紅」芬蘭的教育奇蹟，進而爭相仿效，而忽略了芬蘭在地的（local）的脈絡與文化，恐流於東施效顰之憾，縱能學得其形，卻未能獲致其效。不可否認，芬蘭教師的專業化——不斷提升教師的教育程度，是一條值得各國借鏡的教改途徑。但我們要質疑的是，今天提升教師的學歷，就能夠一併促進學生的學習成果？芬蘭的例子，讓我們明白，該國的教育奇蹟，並不是完全源自於教師的高教育水平，而是部分受到「威權主義」文化傳統的影響，致使師生雙方的地位不平等，便於產出知識性的教育成果。作者 Simola 指出，PISA 測驗有其重大缺陷，它容易和「教師中心教學法」產生共鳴，而芬蘭的教育傳統，正好呼應了 PISA 測驗的評量要求。因此以 PISA 來度量一國的教育水平，是極有問題的。易言之，PISA 附加在教育上的可評量性，讓我們看到了芬蘭的教育奇蹟，也意識到了芬蘭的教育問題。我國在一味強調「提升教師學歷」的同時，更應該看到教師在進修過程中學了些什麼，而其在教學現場又用了些什麼？敞開教師進修的大門，究竟是學生之福，還是教育之禍？畢竟，學生是學習的主體，教師在進修過程中，更應該有所體認，而不是進修到最後，變成一個更加「威權」的教學獨裁者。





導讀文章

Simola, H. (2005). The Finnish miracle of PISA: Historical and sociological remarks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. *Comparative Education*, 41(4), 455-470.

參考文獻

Rinne, R. (1988), Kansan kasvattajasta opetuksen ammattilaiseksi: suomalaisen kansanopettajan tie [From educator of the people to professional of teaching: The path of the Finnish primary school teacher]. *The Finnish Journal of Education Kasvatus*, 19, 430-444.

本文引注格式 (APA)

鄭景澤 (2010, 9 月)。芬蘭 PISA 奇蹟背後的兩個吊詭。臺灣師資培育電子報, 12。檢索日期, 取自 <https://tted.cher.ntnu.edu.tw/?p=321> (註:「檢索日期」請依實際檢索日更改為 XXXX 年 X 月 X 日)